



消費社会的性愛難題：'放開手脚' 解讀《[ダ]威的森林》中文版之'熱'

陸, 曉光

(Citation)

國際文化學研究：神戸大学國際文化学部紀要, 25:107-130

(Issue Date)

2006-01

(Resource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Version)

Version of Record

(JaLCD0I)

<https://doi.org/10.24546/00517638>

(URL)

<https://hdl.handle.net/20.500.14094/00517638>



消费社会的性爱难题

——“放开手脚”解读《挪威的森林》中文版之“热”

陆 晓 光

小引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畅销小说《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森林》），原著封面题有作者自撰广告词——“百分之百性爱小说”。（注1）其中女主人公直子“12岁时就接过吻，13岁时就爱抚过”，21岁自杀。自杀前的自我判断：“我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比通常想象的“更不完整”；她20岁生日夜晚与男友渡边唯一一次亲密接触后，留给渡边的深刻印象也是：“总觉得她的身体不完整。”（注2）这位在小说中可谓命运最惨的少女主人公，至少是作者强调的“百分之百性爱”代表人物之一。那么小说中多次以“不完整的人”词语描述最终自杀的她，意味着“百分之百性爱”与“完整人”之间既有强大亲和力，又可能蕴藏深刻矛盾，这是一个难题。

“完整的人”词语最初出自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的席勒与马克思，作者似乎不经意地让两位困于性爱的男女主人公分别使用了这个具有思想史积淀的词语。村上春树是大学欧美文学专业出身，并且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注3），因此这个词语未必是他无意识使用。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中的著名命题是：“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注4）他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初期文化人变得唯利是图和职业化的倾向。马克思更为频繁使用“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人”、“全面发展的人”之类词语，（注5）其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工厂劳动者，他们沦为机器奴隶并陷于饥寒交迫。两位大师都没有特别讨论“性爱”与“完整的人”之间关系。

但是性爱无疑是“完整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无论作者是否自觉意识，主人公直子的悲剧至少意味着，作者客观上在延续并开拓着席勒与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森林》中有多位性爱主人公，他们各有看来是难以忍受的性爱苦恼，因

此他们也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遭遇着直子的难题。

《森林》出版发行于日本消费社会盛期的80年代，在90年代中国形成不亚于日本的“村上热”。相关研究多年前就称：《挪威的森林》在日本销售量越出700万部的巨数，平均每30个日本人购有一部；而在中国，该小说的汉译发行量三年前达到40万册（注6），相对于中国当代小说发行量也已堪称巨数。

网络世界的情况则是平分秋色乃至反客为主。笔者近日（2005年9月23日）上网以Yahoo日文搜索“ノルウェイの森”（“挪威的森林”的日著原名）得375000条，Yahoo中文“挪威的森林”得353607条；两者大体接近。又以google日文搜索得162,000条，google中文得741,000条；后者为前者的4.5倍多。可见该小说在中文网页中的影响度甚至超过其母国日本。（注7）那么这部未必偶然使用“完整人”词语的性爱小说，这部在当代消费社会影响如此巨大的“百分之百性爱”小说，确实可能意味着我们目前所处的消费社会提出了新的“完整人”难题。

中国读书界对《森林》迄今至少有四种代表性解读——“迷失自我”说、“孤独释放”说、“青春反叛终结”说、“女性主义表达”说等等。（注8）诸说虽然各有所见，却未免都有意无意高蹈于这片茂密“森林”引力场的外围。《森林》之所以引起如此异常之“热”的反应，根本原因缘于其中“百分之百性爱”的表现，这个立意搔到了当今消费社会的痒处。

作者在一次访谈中称，以前他的原则是“不写性”，《森林》中则是“放开手脚来写性”，意图是“想把性写得纯净些”，“越是如实地写就越是没有腥味。”（注9）显然，率直写“性”是作者本人认为不同其以往的创意乃至刻意。如果说相对于中国文学，日本文学素来就有偏爱“写性”特点，那么村上春树的“放开手脚”对于中国读者就是一次两级跳。这个两级跳之所以值得关注，与其说在于该作品本身，毋宁说借此可以反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相关问题。笔者因此以为不妨循着原著思路，姑且也来一下“放开手脚”，从“完整人”的角度率直讨论其中“百分之百性爱”问题。

一、难以言说而诗意表现的性知识

《森林》中多名主人公因性爱苦恼而赴死，但是它首先吸引读者的并非爱情悲剧，比之更能令读者感慨唏嘘的爱情悲剧在当代文学中未必少见，而更可能在于对性爱活动的种种知识性展示，正是后者赋予其“百分之百恋爱”的基本魅力。广义地说，当一部作品以美文学笔调描写了某一客观对象，人们可以称之为具有“诗意”；而按照卢卡奇的严格界说，只有当描写对象涉及“人性和人的命运”时，“客观描写”才可能具有真正“诗意”。（注10）在后一种意义上，《森林》中涉及性知识的描写更可谓富有诗意。例如要说清女主人公直子何以自杀，就必需讲述她的性无能并介绍相关的性知识；而另一女主人公绿子之所以最终赢得渡边倾心，其正常的性欲望与性能力是重要原因。我们先看绿子对男友渡边所作的一番关于渴求性知识的解释：

“渡边君，你别以为我这是淫乱啦性饥渴啦勾引啦什么的，别那样认为，我只是对此深感兴趣，急于想知道罢了。我不是一直在女校女孩子当中长大的吗？因此十分想知道男人在考虑什么，身体结构是什么样子。我只是作为一种情况研究。”（191页）

大学生绿子作为青春期女孩想了解男性的“身体结构”，因为她在女子学校中一直没有机会接触男性。男友渡边是作者本人化身，因此绿子的要求也间接表达了作者“放开手脚写性”的理由。如果说绿子这个愿望相对于比较开放的日本读者也能够引起广泛共鸣，那么在相对传统的中国语境中，读者隐蔽的兴奋反应就不难推想。新近出版的一本针对中国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的教材中写道：

“长期以来，性科学知识的宣教一直被视为禁区，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基本上没有接触性知识教育。在高校中，性教育更是一片空白。他们常常把‘性’与‘黄’等同并论。因而教师和家长都避而不谈有关性的知识，认为这样可以掩盖在青年人中存在的而且日益突出的性问题。”（注11）

根据这本大学最新教材的分析，一方面，青年人的性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性知识的宣教在中小学“一直被视为禁区”，在大学中“更是一片空白”。性知识的供求关系在正规的教育殿堂中如此脱节，那么在教育殿堂之外寻求性知识的满足就十分自然和必然。中国传统儒家一方面在正规教育中提倡“无

怨”的理想人格（《论语》有曰“君子不怨天尤人”、君子“劳而无怨”等），另一方面又网开一面允许在文艺领域宣泄“怨”气（《论语》又曰“诗可以怨”，但是必须“怨而不怒”），那么通过文艺作品满足受压抑的知识欲就还是某种程度合乎古训的了。

《森林》中展示了哪些方面的性知识呢？这里再重复一遍，鉴于这些展示对于我们直面该小说特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追随作者“放开手脚”的描写而作“放开手脚”的分析。下面列举其中若干方面。

手淫

绿子与渡边结识后想到渡边所在大学的男生宿舍去看看，渡边回答说没什么意思，“无非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房间里或喝酒或手淫罢了。”并告诉绿子，男生们“没有人不做”手淫，“自己也不例外”。渡边还提出他的观点：“男生手淫与女孩子来月经是一回事”，在手淫之后去与女朋友约会还有特别功效，可以做到“心平气和”。绿子有点恍然大悟：“这事我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70页）

福柯《性史》中有曰：欧洲维多利亚时代以前曾经是“人人都手淫，人人都不知道别人手淫”。汉语《辞海》1979年版与2000年版皆无“手淫”词条。《日本语大辞典》1995年版释“手淫”曰：“自慰，意同英语onanism”。

意淫

绿子得知渡边平时经常意淫后，希望渡边以自己为对象意淫。渡边在某日夜晚“为了履行诺言”，开始想着绿子自寻欢乐，上不来兴致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有多大效用，于是“索性作罢”。（215页）绿子后来得知渡边意淫失败后激励他：“别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最大限度地想入非非就是”，还提出具体建议：“下次打电话给你，我就说：啊……就那里……妙得很……不得了，我，我不行了……啊，别那样……你就一边听一边来你的。”（245页）

《辞海》1979年版与2000年版皆无“意淫”词条。日文原作该处用的是外来词“マスターベーション”，1995年《日本语大辞典》释该词曰：“源于英语masturbation，指用手等方式使自己获得性快感”。

疏导

渡边第一次去阿美寮精神疗养院看望恋人直子时，对直子谈了自己压抑性冲动的“不好受”感觉。直子说：“给你放出来好么？”“用手？”“嗯。”完事后直子问渡边：“这回好受一点了吧？”渡边回答：“亏你帮忙。”（157页）渡边第二次去阿美寮探望直子时，直子“仍像上次那样用手指把我疏导出去”（260页）渡边后来也被绿子“疏导”过，其感觉是：“她的手法与直子相当不同。两者都妙不可言，然而总有的地方相异，使我觉得是在经受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体验。”（289页）

1979年版与2000年版《辞海》皆无“疏导”词条。

口交

在阿美寮精神疗养院，直子问渡边是否曾和其他人睡过觉，渡边回答没有，并告诉她两个月来始终记着直子帮自己“疏导”时的感觉。直子于是进而说：“那好，这个也记住”，接着她“身体下滑，秀发垂散在我的小腹上……”（260页）

上引中译本文字的最后一段富有暗示处对日文原著作了删略处理，按日文原著“放开手脚”直译则为：“她身体下滑，用嘴唇舔我阴茎，然后温柔地含包住，舌头轻轻蠕动。直子的秀发披散在我的小腹上，与她嘴唇的活动一起摇动起来。于是我再度射精而出。”（注12）

1979年版与2000年版《辞海》皆无“口交”词条。2004年中国出版的一本性学专著写道：“性关系包括性交，也包括用手、用口刺激生殖器”。（注13）

处女性交

渡边在直子二十岁生日时与她性交：“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裸体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相互抚摩身体，吻着嘴唇。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已经睡过。我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43页）

1979年版与2000年版《辞海》皆无“性交”词条。而在解释“月经”词条则如实使用“性交”词语：“月经期间……禁止性交。”又1979年版《辞海》

释“处女”曰：“指未出嫁的女子。”2000年版作了与时俱进的改释：“其一，在室之女，指未出嫁的女子。其二，未曾有过性行为的女子。”

女同性恋

曾经做过家庭钢琴教师的玲子对渡边讲述了一段特殊经历，三十多岁的她被一个十五岁少女诱骗进入同性爱：“她把手绕到我背部摸索起来，摸着摸着，我渐渐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身上火烧火燎的。”“每被她抚摩一下，身体就像肢解一点。等我明白过来时，她已经脱掉我的衬衫，摘下我的胸罩。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这孩子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同性恋者。以前我也经历过一次，高中时跟一个高年级女生。”玲子对小女孩说“不行，快住手”，小女孩则说：“求求您，一会就行。我，实在太孤寂了，不骗人，真太孤寂了。我只有老师一个人，别嫌弃我。”说着，“那女孩抓起我的手贴在她胸前。手一接触，就连同性的我，胸口都禁不住一阵酥麻。我一时不知所措，只是呆呆地一个劲儿地说不行、那可不行。但不知什么缘故，身体却一点动弹不得。高中时还可以把对方一把推开。可那时就是身不由己，如同着了魔一样，只会一口一个不行。”玲子终于将小女孩赶出门外时，小女孩对玲子说：“你是同性恋者，没错。不管你怎么装腔作势，到死都改不了。”而玲子的“同性恋”概念则不同：“严格地说，我不是同性恋者，因为看见那女孩时，从自己这方面并没有积极产生过情欲。”（171页）

1997年版《辞海》释“同性恋”为“与同性者发生性关系，通常对异性不感兴趣。”而2000年版《辞海》增加了贬斥评语：“性变态的一种。”

男女恋爱心理差异

绿子对渡边说，“爱就是允许女孩百分之百地任性”，比如说女孩叫男孩去买酥油饼，男孩气喘吁吁地买回来后，女孩却把酥油饼扔出窗外。“这就是我所追求的”。渡边愕然，“这和爱不相干啊！”“相干！你不知道罢了！”渡边说：“我是觉得相当不尽情理。”绿子再度强调：“对于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得一提的、或者说非常无聊的小事情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那些不这样认为的女孩，“坦率地说，我觉得她们统统是在自欺欺人地逢场作戏。”

（85页）女性的绿子在这里可谓是给男性的渡边上了一堂率真的女性恋爱心理课。

《森林》中关于性的展示与描写还涉及月经与性禁忌（159页、243页）、“背

部非常敏感”（245页）、“连做四次”（315页）、女性的“不湿”（260页、308页）等，其中有些方面即便对于已婚成年男女恐怕也是鲜为所知乃至前所未闻。

这里我们不必再一一追踪作品中的“放开手脚”，从上面列举足以看到，《森林》中涉及了多种性行为、性现象和性心理，这些描写无疑具有某种知识性。这些性知识在学校教育中一般不会具体讲解，家庭父母亲一般也不会直接传授，因此它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在中国语境中，《森林》涉及的有关性爱的常用词语甚至未见载于汉语常用而权威的《辞海》中（“手淫”、“意淫”，乃至最一般的“性交”等）。由此又可谓它对中国读者还具有某种“性扫盲”意义。就系统的性科学知识而言，《森林》中的所涉也许还只是凤毛麟角甚至挂一漏万。但是性知识的传授或教育首先是个面对“禁区”的态度和观念的难题，而并非纯科学、纯学术的难题。因此至少在前一个层面上，《森林》中关于“性”知识的诗意展示已经有了足够引起读者震惊的魔力。

二、消费时代的新式性爱观

马克思《资本论》中一条著名注解提示：首先要研究一般的人性，然后研究历史地发展变化了的人性。（注14）这个方法论也适合我们对《森林》性爱观的解读。前述《森林》展示的性现象，无论人们是否自觉意识或在何时何地才承认其为“知识”，自古以来作为人的本能而客观存在着延续着，恐怕也将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始终；而《森林》表现的性爱态度和观念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后者无疑也是该小说在其出版发行当时（80~90年代以来）引起社会之“热”的重大原因所在。

《森林》的故事发生在日本60年代后期，而故事的讲述则在80年代末期。60年代欧美国家率先进入消费社会，80年代则是日本消费社会的盛期。因此无论是该故事的发生背景或讲述背景，都与消费社会有关。村上春树本人在90年代初特意解释：“其实只是把故事设定在那个年代，语言则是当代的，正因此，才有人读它。”（356页）作者显然是有意识以他写作的那个“当代”读者为对象，其中的性爱叙事渗透着当代消费社会的意识。它的具体图景至少可勾勒如下。

性爱欲望的自主逻辑

在消费社会之前的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中的性爱通常表现为受金钱制约；而《森林》所突出显示的则是高度发达消费社会中性爱自身的需求逻辑。一方面，性爱变得前所罕见地随意和自主；另一方面，金钱至少不再是男女主人公们性爱交往的主要动机或羁绊。《森林》中第二号男性人物永泽曾经与至少80名陌生女孩有过性交往，而他甚至不屑在自己的恋人面前有所隐讳。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而有如此不羁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在以前不发达社会中难以想象。《森林》中第一号主人公渡边并非是性爱态度随便的人物，而他也经常跟随其同学永泽上街以解决“身体饥渴”，甚至还相互交换过各自女伴。（225页）值得注意的是，渡边与永泽作为普通大学生支付金钱的能力都显然有限，而《森林》在讲述他们此类活动时从未提及甚至也没有暗示过付钱的必要。与此形成微妙对照的是，阿美寮疗养院中直子向大姐玲子点弹《挪威森林》歌曲时，倒是令读者感觉意外地按“规矩”支付了一百日元的硬币。（120页）这个叙事细节上的区别至少意味着，在作者看来，主人公们这类自由自在的性交往活动与金钱并无太重要的关涉；进而言之，《森林》主人公们生活于一个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摆脱金钱羁绊的相对自由的年代。永泽对自己不羁的性行为作了如下辩解，这个辩解印证了他的时代的独特性：

“傍晚女孩子们走向街头东游西逛，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

我们转眼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37页）

找女孩子“发泄”是基于男女双方相互的生理需要，因此一方的满足也为对方提供了快乐。虽然这里使用了“买卖”一词，但意思显然指男女性需求和性能力之间的合作，而非性与金钱之间的交换。永泽谈论女性的称谓是“女孩子”，而没有使用“妓女”，这也表明其所谓“买卖”只是年轻男女相互寻求快乐的近乎游戏的活动。村上春树在次年写的另一部小说《舞舞舞》中，曾让一个“应召女郎”作如此自我解释：“我们做这事不仅为了赚钱，此时此刻对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快乐。”（注15）作者看来是想更明白告诉读者，在这个新的时代，有谋生计算的“应召女郎”尚且以其业为乐，何况那些街头游戏的普通“女孩子”们。

《森林》中另一个情节表明，男女间的性交往不仅是互悦和自主的，甚至还可以是一种“助人为乐”的善举。渡边一次在咖啡店消夜时邂逅高矮两个在旅行社工作的女孩，高个女孩不惮冒昧请求渡边“陪一下”同伴的矮个女孩，并特别解释“陪一下”的意思是：“两个女人不好那样做”。原来那位矮个女孩由于其男友移情别恋而正闹情绪。渡边出于帮助意识而应允，一番交谈后与矮个女孩“不约而同地跨进旅馆”。——女孩子因性爱麻烦闹情绪而可以在街上请不相识男孩“帮助”安慰，其率意程度近乎想抽烟者向路人借火。有趣之处还在于渡边与女孩一番攀谈后的感觉：“其实双方都不特别想睡觉，只是如若不睡，事情就无法收场。”（91页）这又类似约定请客和赴宴的双方不宜随意变卦。在这里，性爱活动遵守的已经不是市场法则，而毋宁说更接近于一种看来不无人情味的交往礼节，这种性爱交往礼节显然超出了中国一般读者迄今为止的想象力。

主动的女性

女性在以往的两性关系中通常是被动一方，而《森林》中女主人公绿子对渡边却分明是主动出击者。在大学小食堂初次交往时绿子已能叫出渡边名字，当时渡边对绿子却还毫无印象。女性又通常被认为应该腼腆矜持，而绿子毫无顾忌地告诉渡边：她有过三个月只用一个胸罩的经历，为的是想省钱买一个小煎蛋锅；她曾经在家赤身裸体面对父亲遗像以表达哀思，理由是她本来就是父亲身体中的一个精子；她常作性幻想自慰，而性幻想的对象渡边其时并非是她恋爱意义上的男朋友；绿子还对第三者的渡边讲述她与男朋友出游准备“大干一场”却遭遇月经的扫兴经历，这样的讲述在男性渡边听来也有点匪夷所思。

绿子所代表的并非仅仅是某种女性类型，也并非仅仅是某种通常所谓的男女平等意识，而毋宁说表现出消费社会特有的女权意识：性爱不仅是平等的、而且不妨有一点女性的主动和权利。如果说女权主义思潮是伴随消费时代的出现而来，那么绿子性爱态度的超常主动就更非偶然。绿子被渡边赞美为“春天里一头蹦跳的小鹿”，我们可以补充一下：这是一头在消费社会的“春天”才可能率性蹦跳的雌性小鹿。

双恋“并非罪过”

以往的性爱观通常认定爱情只能专一，一个人同时爱两个异性通常被认为

是对纯真爱情的亵渎。《森林》中的主人公却并不如此观。当渡边因徘徊不定于直子与绿子之间而痛苦不堪时，他的痛苦无疑包含不能专一用情的自责成分。而此时具有“大姐”性格的玲子开导他：“这并非任何罪过，只不过是大千世界司空见惯之事。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荡舟美丽的湖面，我们会既觉得蓝天迷人，又深感湖水多娇——两者同一道理。不必那么苦恼”。（292页）在小说中，玲子既是具有比较丰富生活经历的过来人，也是富有同情心和道德感的正面人物，因此她的劝导并非仅仅个人之见。如果说渡边对直子与绿子的双恋越出了旧有社会观念所规定的合理边界，那么玲子的“并非任何罪过”说则为他的越界提供了辩护理由。如果说渡边的问题和苦恼在消费社会初期普遍存在，那么玲子的劝导也符合某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玲子大渡边十九岁，小说末尾，这个依然保持女孩之心的“大姐”式人物，特意从遥远的精神疗养院赶到渡边住所，为的是促使渡边坦然从刚自杀身亡的直子走向活生生的绿子，而她最终也要求渡边与她“干那事”，其时渡边的心思又与玲子不谋而合。作者叙述的这段情节可谓再度拓展了消费社会性爱空间的合理边界。

赞美“普通人”的性爱观

消费社会的消费主体是大众，在高度发达社会中，这个“大众”包括人数急剧增多的受过文化教育的群体。《森林》中的主人公大多是自觉认同“普通人”的大学生。渡边对绿子的自我介绍是：“生在普通家庭，长在普通家庭，一张普通的脸，普通的成绩，想普通的事情。”（122页）渡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确实被刻意描写为具有“普通人”倾向。例如他在大学宿舍观看窗外广场上的降国旗仪式时，会提出这样的奇怪问题：“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纵然夜间，国家也照样存在，做工的人也照样不少。巡路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侍、值夜班的消防队、大楼警卫等等——这些晚间工作的人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保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13页）在与异性交往方面，渡边对富家女子的感觉是：“尽管可爱，但是对于我却是太高雅了”，这些高雅女孩“头脑中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是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他觉得与自己合得来的是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却可以无拘无束交谈的女孩子”。

（23页）渡边对初美为他介绍的女孩更有近乎本能的反感，因为“初美就读的

那所大学，里边全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38页）

渡边爱上绿子并非偶然，原因之一是绿子的“普通人”意识不亚于渡边。绿子出身于经营小书店的普通家庭，父亲“玩命操劳一辈子，结果却什么也没有留下”，死后“像泡沫一样消失”。（250页）绿子在一所私立女子高中“念了六年，却怎么都上不来好感”，因为这所学校“清一色是有钱人家”；她直到进入“周围全是普通人”的大学时才感觉自在。（69页）当渡边善意劝告绿子抽烟后不要像“砍柴女”那样使劲碾灭烟头时，绿子反而乐意接受这个定性：“我就是砍柴女嘛。”（77页）绿子从不追求与别的女孩“两样”，而认定那些刻意追求与众不同的女孩不过是“自欺欺人或逢场作戏”。（85页）绿子对渡边的那段爱情告白突显的也是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优越性：“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女孩儿，而且现在就在你的怀抱里表白我喜欢你。只要你一声令下，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虽然我多少有点蛮不讲理的地方，但是心地善良，勤快能干，脸蛋也相当俊俏，乳房形状也够好看，饭菜做得又好，父亲的遗产也办了信托存款，还不以为是大拍卖？你要是不买，我不久就到别处去。”（286页）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写这个人物，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大众社会中普通女孩率真性情的赞美。

《森林》中最具高贵气质的女性是初美，她对所心仪的男友永泽既能忍辱等待而又决不迁就苟合。她虽然并不十分漂亮，性格气质却给渡边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心灵震颤”。在她被永泽抛弃而失恋自杀后十多年，渡边才终于领悟到这种心灵震颤来自于一种少年时代才有的“从来不曾实现而且永远不能实现的憧憬。”

（231页）然而即便是初美这个引起渡边心灵震颤的“憧憬”，也被作者描写为与“普通人”其实并无二致，小说中初美对渡边这样告白：“什么人生观啦责任啦，怎么都无所谓。结了婚，每晚给心上人抱在怀里，生儿育女，就足够了，别无它求。我所追求的只是这个。”（236页）

消费社会中的“大众”，在今天不少文化评论者那里更多地被描述为受市场无意识驱使的、日益丧失自我性情的负面形象。这种描述确实不无所见乃至有其深刻，但是也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大众”之中难觅性情，因而率真的性

爱只能幸存于高居于大众之上的富贵小众。如果说这种错觉确实存在，那么《森林》中对“普通人”恋爱的特别钟情与赞美，就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也许是更为接近当代日本社会现实的图景：在平凡的普通人群体中更可能找到纯情率性的恋爱，在普通人的恋爱追求中仍然不乏堪称高贵的“憧憬”。无论如何，《森林》在消费大众中的不寻常人气，无疑得益于人数众多的“大众”对“普通人”恋爱观的认同和共鸣。

“不信革命，只信爱情”

消费社会的另一特点是，以“革命”话语为中心的旧有意识形态观念开始消解。在《森林》所设故事背景的60年代末期，日本发生过激进学生占领大学校园与警察对抗之类事件，这个背景可谓“革命”话语风行。但是《森林》的叙事是在约20年后的日本消费时代，因此具有反思性。如果说旧有意识形态观念包含着“若为革命故，爱情也可抛”的理念，那么小说中绿子的表白就是针对性的：“我才不信什么革命哩，我只信爱情。”（196页）这个爱情宣言包含着对“革命”话语的革命性颠覆。绿子刚入大学时参加过一次高年级学生组织的政治集会，在这次活动中，她因为是女性而被要求带20个寿司饭团去奉献“革命”会议；她虽然热心准备，却因为寿司饭团中没有价格昂贵的鲑鱼而受奚落。绿子由此觉悟到那些自诩关怀“印度穷孩子”的“革命”者的真面目：“这些家伙全都是江湖骗子，自鸣得意地炫耀几句高深莫测的牛皮大话，博取新入学女孩儿的好感，随后就把手伸到人家裙子里去——想的全是这玩艺儿，那号人。一上四年级，就赶紧把头发剪短，忙不迭地钻到什么三菱商社、什么东京广播局、什么IBM公司、什么富士银行找份差事……”（195页）绿子看破“革命”的觉悟与渡边殊途同归，后者鄙视“革命”学生的原因看来是他们智能低下，他们的演说“一派陈词滥调”，“这帮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象力的枯竭。”（63页）

绿子与渡边拒绝“革命”的理由未必坚强：把60年代热心“革命”的大学生斥为“全是江湖骗子”毕竟只是作者的一时之见，那时的社会事件既可以说是缘起于“想象力枯竭”，也不妨说是“想象力”异常激扬的结果。作者本人在仅隔一年后写的另一部小说中，也是借主人公之口转而感叹“令人怀念的六十年代”，

甚至赞叹那个“时代真是好极了”。（注16）但是绿子与渡边以恋爱拒绝“革命”的态度，相对于意识形态话语被认为接近终结的80年代以后社会大众心理，却是相当契合。

不应忽略的还在于，从世界范围看，60年代“革命”风潮在东方世界是与禁欲主义并驾齐驱，例如中国“文革”中；而在西方欧美，则突出表现为反资本主义压抑的性解放运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有这样的口号与标语：“吻你爱人的时候，枪不要离手”，“我把我的欲望当作现实看，因为我相信欲望是我的现实性格”。（注17）美国60年代思潮中，“性革命”话语甚至某种程度地替代了“政治革命”话语。当时流行的说法是：“这个伟大世界所需要的是多一点性欲，少一点纠纷”，“一切反对或对立的原型都是性行为”。（注18）此外，女性在60年代风潮中争取的权利包括与性解放相关的“自由堕胎和避孕”。

（注19）由此看来，《森林》主人公们拒绝“革命”的恋爱观本身也源于欧美60年代以后的消费社会。村上春树的大学专业是欧美文学，他让《森林》中身处日本60年代末的绿子说出“不信革命，只信恋爱”，不妨说是表达了一种起始于欧美消费社会的新式“革命”观。

三、两个关键难题：无爱的性欲与无性欲的爱

《森林》的最迷人之处在于提出了两个直面性爱的关键难题：即如何对待无爱的性欲和无性欲的爱。这两个难题自从人类开始把“爱情”赋予男女之性时就已经提出。柏拉图著名的对诗人煽动情欲的严厉批判和传说他本人的精神恋爱可谓西方的最古典表征。中国先秦《周礼·地官·媒氏》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注20）这是说，即便男女之间已有固定婚配的性爱对象，也仍允许在一定时间内不禁逸出，并以法令形式作出明文规定，乃至需要对“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可见先贤对此问题的严肃重视。当战国时代齐宣王颇感惭愧地对孟子承认“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时，孟夫子以老师的口气教导他，你的“好色”不是“疾”，自古大王多好色，你的过错在于作为一国君主而未能推己及人：“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注21）虽然中外历史上对性与爱之关系提出过各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在现代消费社会中，这两个老问

题却似乎又成为需要重新讨论的难题了。《森林》中的讨论可谓搔到消费社会的既痒又痛之处。

无爱的性欲

主人公渡边的性态度彷徨于性爱和性欲之间。宽容地说，他与直子、绿子乃至玲子的性关系都具有爱意，因此都属于性爱；他与街头陌生女孩的性关系则属于无爱的性欲。渡边本人对自己的无爱之性欲时有反省自责，他在周末夜晚喧闹的新宿街头徘徊了几小时后，“目睹人们释放出来的由性欲和酒精相混合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能量，不由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性欲简直猥琐得不足挂齿。”（89页）问题在于，渡边既然意识到此时自己的性欲是“猥琐得不足挂齿”，为什么还是不断上街寻找陌生女孩？小说中通过渡边与并非是他恋人的女性初美的一段对话直截讨论了这个难题——

初美：“何苦做那种事？”

渡边：“有时非常想和女孩子睡觉。”

（初美劝渡边改邪归正，渡边也觉得应该改邪归正。）

初美：“那为什么不改呢？”

渡边：“有时候需要得到温暖。如果没有体温那样的温暖，有时候就寂寞得受不了。”（227页）

渡边的回答虚弱疲软而率真有力。渡边当时还没有确定的恋人，他上街找女孩是出于身体需要，那么问题在于当时他的身体需要是否有可辩护理由。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森林》次年写的另一长篇《舞舞舞》中，借其中主人公“我”对一名少女说的话而专门解释男性性欲：“有一种东西叫做性欲，就是说想同女人睡觉——这是自然规律，为了保持种族。”“假定你是一只鸟，假定你喜欢在天上飞并感到十分快活，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你只能偶尔才飞一次。比如因为天气、风向或季节的关系有时不能飞。如果一连好几天都不能飞，气力就会积蓄下来，而且烦躁不安，觉得自己遭遇到不应该有的贬低，气恼自己为什么不能飞。这种感觉就是性欲。”（注22）这段解说意味着，男性身体的自然需要决定了他总是倾向于寻找某种方式来排遣，排遣无可厚非，恰如精力充沛的鸟儿需要经常展翅高飞一样。《森林》与《舞舞舞》中的叙事主人公都有作者本人投影，因此我们

可以判断，作者本人对于男性的纯性欲大体是持坦率承认和为之辩解的态度。

上引这段对话是在男性渡边与女性初美之间展开，在小说中，这样的问题并没有提出于永泽与渡边这两位男性之间。初美向渡边的询问已经显示了她作为女性而对男性身体需要的某种困惑不解。小说中的另一处，永泽对初美的告白则明确提出了男女之间的性差问题。永泽断言初美“不可能理解男人性欲那东西”。

（227页）现代科学研究认为，男性与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别要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大得多，这种生理差别深刻影响着各自心理、精神乃至思维方式的不同倾向。例如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在精神方面，两者的差异通常表现为“男性难自控，女性易悲观”。（注23）这个结论正好吻合男性渡边、永泽与女性初美之间恋爱心理的差别——渡边在“体温”需要的驱使下难以“自控”地上街找女孩，永泽对初美告白：“我体内有一种类似饥渴的感觉，总在寻求那种东西。”（227页）而初美则是在被男友离弃后“悲观”至于自杀。由此看来，《森林》对这个问题的直观描述与现代心理科学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渡边对无爱的性欲持一种低调辩护态度，然而也坚持了一条底线：不使对方受伤害。这里的“对方”包括性爱对象与性欲对象。渡边的言行大体是一致的。首先，他上街找女孩满足“体温”需要最初是在尚未确定恋爱对象时发生，因此不构成对性爱对象的伤害。其次，他开始与直子相爱后再度上街找女孩，是在直子住入精神疗养院期间，其时渡边一直真诚关心直子并坦率告白，事实上直子也并未因此有受伤害之感。再次，渡边与街头女孩的交往始终限于双方默认的“体温”范围内，默认的规则是不询问对方姓名背景。小说叙及有一次渡边被女孩方打听他的详情背景，渡边的反应是很不以为然。（45页）这意味着在渡边意识中性欲与性爱之间界限分明，不应混淆。如果说真正的“伤害”只有在事关性爱对象时才会发生，那么渡边这种界限分明的态度也可谓是自觉避免不使对方受伤害。此外，渡边对绿子产生朦胧爱意后，尽管他对绿子几乎无话不谈，尽管绿子十分乐意接受渡边，渡边却始终没有越界行为，原因在于其时他自觉维护对直子的感情，后来他把这种感情视为“一种不能放弃的责任”。（286页）这又表明在渡边意识中，“地道”的性爱态度是只能选择一个对象，同时置身两个难免造成其中一个受伤害。渡边最终选择了绿子，客观上造成了对直子的伤害，直子缘

此自杀。但是这种“伤害”已经不是“性欲”对“性爱”的过错，而是“性爱”本身无可奈何的事情了。正如玲子后来对渡边所劝慰，在两个所爱对象中最终必须选择一个，而一旦选择，“即使再竭尽人力，该受伤害的人也无由幸免。所谓人生便是这么回事。”（292页）由此看来，无论在对待性欲或性爱方面，渡边的态度和行为都可谓自觉避免她者受伤害。

永泽与渡边不同，渡边时时反省自责“猥琐”性欲，永泽辩护自己放肆行为却是理直气壮，他在性爱对象初美面前所提出的理由正是“谁也不受伤害”。

（227页）当初美以“我受伤害！”反驳他时，他也开始“觉得很抱歉”了。（227页）这说明是否“伤害”她者的底线在永泽观念中某种程度地存在。永泽的真正问题是，虽然他以“谁也不受伤害”为自己辩护，而实际行动却是毫无顾忌伤害初美。他与初美作为恋人相处三年，其间肆意与陌生女孩睡觉；他在谋得出国任职机会后，与相处三年的初美断然分手；他在得知初美自杀消息后写信告诉渡边，语气中流露的是旁观者式的“不胜悲哀”。（231页）初美的自杀至少与永泽的伤害有关。渡边读到永泽来信后断然与之绝交，这说明渡边无法容忍永泽对初美的伤害，他把不“伤害”女性同时作为评判男性朋友永泽的底线。据说渡边形象尤受女性读者青睐，原因之一当也缘此吧。

如果说永泽对初美的伤害多少还是出于无意（他至少没有故意欺骗初美），那么《森林》中那个十三岁的同性恋少女对待玲子的方式则是恶意的了。这个小女孩之所以被作者评价为患“心病”而“烂入骨髓”，并非因为她是同性恋者，而在于她“对任何人都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恶意”。（167页）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极度贬斥，显然也是出于同一条底线。

“谁也不受伤害”这个底线也包括受身体需要驱迫者本人。玲子得知渡边经常同街上女孩往来后这样劝导：

“听我说，我并不是说你和女孩子睡觉有什么不妥。如果你觉得那样可以，也无所谓。因为那是你的人生，应该由你决定。我要说的，只是希望你不要用不自然的方式磨损自己。懂吗？那是最得不偿失的。十九二十岁，对人格的成熟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无谓地糟蹋自己，到老时会感到痛苦的。这可是千真万确。所以，要慎重地考虑。”（128页）

这番劝告有三个要点：其一，只要不使别人受伤害，与女孩子随意睡觉没有什么“不妥”；其二，但是这样做对自己的人格是一种“磨损”；其三，对于十九二十岁的青年人来说更是“糟蹋自己”、“得不偿失”。事实上，大学生年龄的渡边每次上街与女孩睡觉后，内心确实总是充满“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36页），玲子的劝告触及他的痛处。无爱的性欲也许无可厚非，但是无爱的性欲肯定会付出精神受损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否值得付出？玲子希望渡边“慎重考虑”的问题，想必也是消费社会众多男性渡边们需要直面回答选择的吧。

无性欲的爱

《森林》的中心悲剧人物直子经历过两次失败的性爱。前一次的结果是男友木月自杀，直子留下内心剧痛；后一次与渡边相爱的结果是患上忧郁症，最终自杀。先说结论——两次性爱悲剧的直接原因皆可归结于无性欲之爱。

在小说叙事中，木月自杀对于渡边一直是个百思不得其解之谜，而对于直子则是个难言之隐。然而这个难言之隐在直子与渡边成为恋人后无法回避。直子住入精神疗养院后给渡边写信，含蓄而反复暗示：“我是个比你想像的要更不完整的人”。（95页、98页）渡边依然不能理解，在他看来，直子的“不完整”仅仅在于患精神忧郁症。当渡边到疗养院看望直子时，直子在渡边的怀抱中终于直白吐露：

“我为什么就不湿呢？我出现那种状态，真的只有那一回，只有20岁生日那天，只有你抱我的那个晚上。以后为什么就不行呢？”（260页）

直子作为“不完整的人”的关键问题在于生理上缺乏“湿”的性能力。她与渡边亲密接触后患上忧郁症的起因也是缘此。直子对照顾她的病友玲子大姐也倾诉过：

“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中只有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就毫无所感，既无冲动，又没有湿过。”当玲子以过来人的经验劝慰直子，随着年龄增长自然会好转时，直子却断然回答：“不是那么回事！我什么也没有担心，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面，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307页）这又表明，直子不仅缺乏性爱所必要的生理欲望，而且男性的生理欲望对她还是无法忍受的痛苦。直子的悲剧在于她虽然有性爱的心理要求，却基本上没有性爱的生理能力。因此她对渡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假如我一辈子都不能性交的话，你是否也能喜欢我？”

渡边以“我是乐天派”的含糊其词安慰直子。确实，这个问题对于才二十岁的渡边，实在是太难作出更能令直子欣慰满意的回答了。我们只要寻思一下如今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大版面刊登的性健康治疗广告，就不难感悟直子提问中的焦虑与渡边回答时的窘迫。事实上，渡边即便在自责“猥琐”时也上街找陌生女孩以满足身体需要。因此读者难以想象他在青春时期会乐意接受一个不能与之性交的恋爱对象。与“不完整”的直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直子的竞争者绿子对渡边强调：

“我可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女孩儿”。（286页）由此对比可见，渡边最终之所以在直子与绿子这两个他都喜欢的女孩之间“始乱终弃”，选择后者，基础性原因在于两者之间这个生理差别，尽管这个差别未必全部原因。

直子前此与木月的恋爱悲剧也是根源于同一个生理上“不完整”原因。在疗养院她对渡边吐露以前与木月之间“就是不行”的亲密关系：

“同木月君睡觉也未尝不可，当然他也想和我睡来着，所以我俩不知尝试了多少回，可就是不行，不成功。至于为什么不行，我却一点也弄不清。本来我那么爱木月，又没有把处女贞操什么放在心上。只要他喜欢，我什么都心甘情愿地满足他。可就是不行。”“一点也不湿润，打不开，根本打不开。所以痛得很。又干又痛。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们俩。但无论怎样就是不行。用什么弄湿了也还是痛。就这么着。我一直拿手和嘴唇来安慰木月……明白么？”（124页）

十分清楚——木月深爱直子，直子却不能与木月像正常人那样在身体层面上亲密接触。木月的自杀不乏幼稚成分（当时他才十七岁），而直子在他自杀后之所以陷入深深的自责自怨，原因在于她明白木月自杀与自己性无能有关。

进一步的问题是，直子何以变得如此“不完整”，何以会缺乏正常人所具有的性爱能力？她是天生如此的吗？这个问题也是直子本人一直追问自己的。她对渡边说过：

“我时常这样想，……假如我健全，（一开始便是健全的哟），你也健全，而木月君又不在，那么将会如何呢？”（98页）

直子这里似乎不经意地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她本来是“健全”的，后来才变得“不

健全”。那么这个病变是缘何发生？《森林》的叙事有意识地强调了直子与木月自幼就开始的“同普通男女有很大区别”的亲密关系，从而向读者暗示了寻求病源的线索。据直子与渡边交谈时的一段回忆，直子与木月“3岁时就形影不离”，“12岁时就接了吻，13岁时就已经相互爱抚过了”。直子的回忆中将这种关系称为“早熟”：

可我一点儿也没意识到我们早熟，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要摸我的身子，任他摸我也满不在乎，要是他想一泄为快，我会帮助他而丝毫不以为意。我们俩相互细看对方的身体，像是互相共有似的，真是这种感觉。……总之，我们就是这样手拉手长大的。普通出于发育期的孩子所体验的那种性的压抑和难以自控的苦闷，我们几乎未曾体验过。”（141页）

这段回忆可谓是直子对自己何以变得“不健全”的反省分析。除了早熟外，两人与普通孩子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们几乎没有经历过性压抑的苦闷，双方于对方的身体熟悉备致，如同自身，以至没有间离之感。直子反省后的自我诊断是，正是这些幼年过早的亲密接触，导致了她们俩后来的悲剧：

“我们在应该支付代价的时候没有支付，那笔帐便转到了今天。正因为这个，木月才落得那个下场，我才关在这里疗养院。”（142页）

直子的自我诊断是否中肯，也许还有待性医学专家们的验证。但是一方面，村上春树在“后记”中称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318页）其中直子的悲剧是作为一个令叙事主人公渡边刻骨铭心的真实故事和中心事件而讲述，因此直子悲剧的原因无疑也是作者所关注并倾力探究的焦点问题。另一方面，直子的自我分析是《森林》中对这个中心悲剧的唯一分析，因此可以认为，她也传达了作者本人对这个悲剧之原因的看法。如果说直子的自我分析提供的还只是其悲剧原因的一种可能解答，那么这个解答至少提出了一种可能有效的防御方法，即禁止幼少年过早亲密接触。如果说现代医学并没有提供一种超出直子自我诊断之外的结论，那么直子的自我诊断很可能也是唯一切实的诊断。

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已经相当程度地消解了性压抑禁忌，但是性禁忌的完全消解是否意味着果真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人”？直子与木月的恋爱悲剧客观上从另一个维度提出了质疑。直子的自我诊断提示，对于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在幼

少年时期没有性压抑经历，不仅在过程上而且在结果上，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生理上，都可能导致“不完整的人”。

但是我们有理由再度追问：直子与木月在幼少年时期何以能够如此超乎常规地亲密接触？他们姓氏不同，来自两个家庭，其父母亲们那段时期在干什么？这两个孩子很早就有丧失成人关怀的“孤岛”感觉，那么其家庭父母有无责任？假如说他们父母也有其无可奈何的理由，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无可奈何？《森林》中没有提出这类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他们父母亲的背景。并非偶然的是，在次年发表的《舞舞舞》中，作者写了一个十三岁女孩在人世间孤独漂流的故事，她的父母亲在社会上功成名就却相互离异，她本人在物质上随心所欲却在精神上不知所适。也许作者是想通过这个新的故事作进一步的思考。那么至少在《森林》的讲述范围内，寻求诊治无性欲之爱的答案仍然是个难题。不过继续追究已经超出本文范围。

本文开首提到，“完整的人”词语在马克思那里主要关注的是早期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者，他们沦为机器奴隶并陷于饥寒交迫。但是马克思也兼而注意到这种状况对劳动者性爱生活的腐蚀。下面是《资本论》中的一段相关描述：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雇佣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身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俗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白天的重活，就换上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注24）

其中“蓬头垢面”的状况对于今天消费社会中具有消费能力的少男少女和成年男女们来说，显然已经是过去的故事了；“从幼年起就终身沦为放荡成性”的描述也显然不宜移植到直子这样的悲剧少女身上。但是，无虞温饱的、在物质生活上可谓自由自在的直子，乃至《森林》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却依然为性爱苦恼，甚至为之自杀。那么，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森林》描叙的“百分之百性爱”

之矛盾，客观上确实向消费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们提出了新一轮的“完整人”的难题。

2004年11月初稿于上海

2005年10月修订于神户

注释

(注1) 日本讲谈社文库本该小说上册的封腰文字是：“无限的丧失与再生·极端的恋爱小说”（“限りない喪失と再生を描く、究極の恋愛小説”），下册是：“激烈、幽寂、哀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激しくて、物静かで哀しい、100%の恋愛小説”）。

(注2) 日文原作至少有三处写到直子的“不完整”，日文使用的是“不完全な人間”。分别见日文原著《ノルウェイの森》第127页（2次）、第192页（2次）、第213页；据《村上春树全作品》第6卷，讲谈社，2003年第四次印刷本。中译本参见《挪威的森林》第95-98页等；林少华译，漓江出版社，1996年7月版。本文后面引用该小说而仅标页码者皆出此中译本。

(注3) 《挪威的森林》男主人公渡边读过《资本论》，赞赏马克思“整体思考”的方法。渡边形象无疑有作者本人投影。见该小说中译本第25页。又，在作者次年写的《舞！舞！舞！》中频繁出现“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词语，参见拙文《“小资偶像”背后的马克思幽灵——解读村上春树〈舞！舞！舞！〉》，载《文景》杂志，2004年第三期。

(注4)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81页，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注5) “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人”，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面发展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8—109页，《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9节，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注6) 关于《挪威的森林》在中国的出版发行量, 国内相关论文有不同说法: 2000年的统计数字是“30万册”(林少华《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 《译林》2000年第2期), 2003年的数字是“40万册”(周淑茹《写在青春的边缘上——析〈挪威的森林〉畅销之原因》, 《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1期)。又关于《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的出版发行量, 国内至少有三种不同说法: 一说认为截止1999年10月为止, 发行量为“446万册”(孙树林《井·水·道——论村上春树文学中的老子哲学》, 《日本研究》2001年第4期)。光按: 日本人口数为约1.2亿多, 因此这个数字符合“在日本平均每30人拥有一本《挪威的森林》”之说(李静宜《孤独的释放与安置——村上春树和他的〈挪威的森林〉》, 《新闻爱好者》2002年第7期)。一说认为“700万册”(周淑茹《写在青春的边缘上——析〈挪威的森林〉畅销之原因》, 《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1期)。又一说认为“1500万册”(叶岗《迷失自我的象征性森林——〈挪威的森林〉赏析》, 《名作欣赏》, 2002年第3期)。笔者以为“700万册”之说较为可信。查日本相关网页, 据一个名叫“Wolfman's Blog”的艺术网站, 其2005年2月11日上贴的评介《挪威的森林》的文章写道: “这部作品上下卷合为一部, 迄今发行已超过700万部, 如此受普遍欢迎实在罕见, 令人惊愕。”(<http://blog.livedoor.jp/wolfmanno1119/archives/14072214.html>) “700万部”的说法与上引“700万册”吻合。该小说的日文原作版式分为上、下两册, 因此中国研究者的“1500万册”之说, 也可能是两册为一部的“超过700万部”的讹说。

(注7) 日文网页中“村上春樹”1,190,000条, 中文网页中“村上春树”1,052,250条(含繁体字2250条)。两者比照, 后者为前者的约九成(0.89)。这个日本小说家之名在中文网络中的出现频率相当接近其在母国频率, 如此现象也是鲜见。

中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因此在中文网络中以马克思话语为参照系比较当不无意味。本文初稿写于2004年11月, 当时上中文google网搜索结果是, “村上春树”214000条, 逼近“马克思”的

218000条；“挪威的森林”53600条，多于“资本论”31800条的近两倍。约一年后的现在修订本文时再度上网搜索，发现两组的数量都各增长了一位数字，即分别由原来的数十万位增长至百多万位，或从原来的万位增长至数十万位——中文网页“马克思”（含繁体字“馬克思”）得1,350,000条，与“村上春树”1,052,250条同位数层面接近而略多。“资本论”（含繁体字“資本論”）得161,000条，远远低于“挪威的森林”741,000条，后者是前者的4.5倍。如此看来，这道源出日本“森林”的风景，在中国特色的网络语境中不仅未曾褪色，相反是与时俱进而愈发郁葱。

再比照日文网页：“ノルウェイの森”162,000条，“資本論”1,950,000条，前者仅为后者的8%，即一成不到；换言之，这个“挪威”的森林在日文网页中呈现为“資本論”森林的零头。由此比照看，《挪威的森林》在中文网络世界中的热度，更可谓远远超过日文网络世界。又，《資本論》在日本网页中的出现频率是中文网页的十多倍（1,950,000条：161,347条），这也许是另一个值得玩味的对比数。

（注8）参见笔者研究生梁彩丽论文《中国关于村上春树研究的综述》，载香港《现代人文评论》杂志，2004年9月号。

（注9）见《挪威的森林》所附作者本人文章，第357页，译本同（注1）。

（注10）卢卡其（G. Lukacs）在其美学论文《叙述与描写》中写道：“事物只有通过它们与人的命运的关系才能获得诗意。”“一种脱离人、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事物的诗意’，在文学中是没有的。”见《卢卡其文学论文集》第一卷第65-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11）陈英主编《大学生健康教育》第98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

（注12）原著被汉译过滤了的性爱描写有多处。相关的该段日文为：“‘じゃあ、これも覚えていてね’と彼女は言っけて体を下にずらし、僕のペニスにそつと唇をつけ、それからあたたかく包みこみ、舌をあわせた。直子のまっすぐな髪が僕の下腹に落ちかかり、彼女の唇の動きにあわせてさらさらと揺れた。そして僕は二度めの射精をした。”见《村上春树全作品》第6册第342页，讲谈社，2003年第四次印刷本。

- (注13) 潘绥铭等著《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 and 性关系》4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 (注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9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 (注15) 见《舞!舞!舞!》第188页，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 (注16) 同上，第186页与第75页。
- (注17) 《法国1968年：终结的开始》第20、41页，安琪·夸特罗其、汤姆·奈仁著，赵刚译，三联书店，2001年。
- (注18) 《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第252-257页，[美]戴维·斯泰格沃德著，周朗、新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6月。
- (注19) 《1968年：反叛的年代》第183页，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著，范昌龙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 (注20) 《周礼·地官·媒氏》，见《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
- (注21) 《孟子·梁惠王下》，杨伯峻《孟子译注》本，中华书局，1960年。
- (注22) 《舞!舞!舞!》327页，同(注14)。
- (注23) 参见《科学家诠释性别差异：男性难自控，女性易悲观》，载北京《环球时报》2004年7月23日。
- (注24) 《资本论》卷一，《马恩全集》卷23，第509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